

约翰·邓恩《跳蚤》主题论析

张 武,徐雯雯

(龙岩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龙岩 364012)

【摘要】发生在《跳蚤》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智斗”呈现出一种互动的对话关系,而作为这场“智斗”的见证者——“跳蚤”——则体现和强化了诗人“活在当下”的时代情绪。倘若把诗歌中男女主人公的互动式“对话”同贯串全诗的跳蚤意象结合起来思考,则不难发现:《跳蚤》一诗实质上是诗人内心深处互不调和的两种道德观念激烈斗争的外化表现。毋庸置疑,诗人的这种灵魂双声性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渊源。

【关键词】《跳蚤》;约翰·邓恩;玄学派诗人

【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1-0051-03

《跳蚤》虽说是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被收录次数最多的诗篇之一,针对它的研究评论却极少。国内外仅有的寥寥数篇评论要么聚焦其玄学特征,要么关注其艳情成分,其中,后者还常常将诗中的“我”等同于诗人自己。目前高校通用的国家“十五”规划教材《英国文学选读》(第二版)在介绍本诗时,结合了上述两种解读,如是论道:“(该诗)以诗人向情人求爱的口语体写成,语气富有调侃,比附出乎通常想象,推理和结论也超乎意料,反映了邓恩式的奇想。”^{[1](P22)}第一类解读尽管缺乏新意,但把它的成果视作玄学派诗人擅长奇思妙喻的新佐证倒也无可厚非;第二类解读往往把诗中的“我”理解成邓恩本人,极富争议,值得商榷。

《跳蚤》以英语诗歌独有的诗歌形式——戏剧性独白——展开,全诗三个诗节俨然三幕独角戏,男性主人公的话语不仅生动地刻画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也成功塑造了一个沉默但极具个性的女性听众。在论及戏剧性独白的创作特点时,国内学者肖明翰把它同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做了比较,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能从诗中找到证据(如姓名、身份、性别、时代与地点等)或迹象(如在道德观念、情况掌握等方面)表明说话者不是诗人自己。^{[2](P30)}这一结论固然是对早期评论家关于戏剧性独白研究成果的突破和补充,但仔细思考之,仍不失武断,因为在诗中找不出说话者不是诗人的证据和迹象并不一定能得出说话者就是诗人自己的结论。在《跳蚤》中,我们的确找不出说话者不是诗人的证据。然而,除了说话者的男性身份跟诗人一致外,《跳蚤》中同样找不到相反的证据表明说话者就是约翰·邓恩本人。当然,我们也断然不可仅凭性别身份这一点就贸然判定:说话者和诗人的身份是重合的。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在邓恩诸多的爱情诗中,至少有三首是

以女性的口吻写就的,它们分别是《破晓》、《自恋》和《受到限制的爱》。

众所周知,擅长思辨的玄学派诗人总是倾心借助奇特意象进行形而上的探讨,他们的诗歌一向鲜见对于具体人物的刻画。《跳蚤》中的主人公没有姓名、地位、时代和地点等具体信息,我们单凭诗歌本身所能推断出的唯有其作为男性的身份特征,这也许正是《跳蚤》的独特之处。通过这首以戏剧性独白形式写就的诗歌,诗人着力塑造的也许正是这样一个高度抽象化的男性形象。阅读《跳蚤》,我们猜不出主人公的年龄、想不出主人公的长相、看不出主人公的衣着,呈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唯有一个朦胧模糊又似乎清晰可辨的男人。就连那个作为戏剧性独白所不可或缺,沉默但却产生影响的女听众也不可避免地被刻画成为一个高度抽象化的人物。阅读诗歌同样无助于我们了解她的姓氏和身份,推测她的容貌和芳龄,判断她的胖瘦和美丑。唯一能够加以确认的信息是:这,是一位女性。事实上,《跳蚤》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它所演绎的故事实质上更像是一则超越时空观念、高度抽象概括、发生在男女性别之间的人类寓言。

对于男女关系的探讨,在约翰·邓恩诸多爱情诗篇中并不陌生。譬如,张德明就曾经令人信服地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过邓恩的第十九首哀歌《上床》,认为该诗的“诗体本身就含有粗糙的征服欲望和暴力倾向,而整首诗的叙述过程本身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男人征服女人的性暴力行为展开的过程。”他还进一步指出,《上床》中的女人“始终处在一个无言的‘失声’状态。她对此事有什么感觉、愿望、要求?她是完全俯首帖耳,顺从了男主人公的要求,还是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抗争等等,我们一无所知。整个说来,她只不过是一个‘他者’,一个用以证

收稿日期:2011-11-23

作者简介:张 武(1978-),男,山西长治人,英语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英语教学。

实男性权利的客体,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和表达自己身体感觉的话语权。”^[3](P38-9)]我们承认,这样的女性形象在约翰·邓恩的爱情诗中比比皆是。

不过,让人惊奇的是,《跳蚤》中的女人却被诗人塑造成了一个勇于抗争,敢于拒绝,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和表达自己身体感觉的话语权的女性。的确,《跳蚤》同《上床》一样,以男人的独白开头,以男人的独白结尾,然而《跳蚤》中男人的独白首先缘起于女人的拒绝,详而言之,即女人对于男人提出的要跟她发生肉体关系的要求的拒绝,才是《跳蚤》情节发展的真正开端。在《跳蚤》中,我们确实找不到女人的原声,可是,她的声音和反抗却间接地透过男性的独白折射了出来。比如,诗歌第二节开篇的“Stay”一词暗示读者,男人在第一节诗歌里费尽心机诱劝女人答应他的要求的话语全部无效,女人的“拒绝”意志并没有因为男人的劝诱而产生丝毫动摇。有了女人“举手欲拍”的动作,方才引出男人的“喝止”行为。再如,诗歌第三节以男人对女人的嗔怒开始,而男人的嗔怒又一次缘起于女人不听劝诱,果断拍死跳蚤的行动,这就进一步印证了女人捍卫自己身体控制权的决心。另外,《跳蚤》中的女人对男人并没有显示出丝毫畏惧感,拍死跳蚤以后,她甚至以非常俏皮的胜利口吻回敬男人的“嗔怒”：“(杀死跳蚤)你我并没有因失血而变得虚弱呀”。诗歌结尾,不愿善罢甘休的男人仍在继续设计说服女人接受自己的要求,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男人最终战胜和征服了女人。因为《跳蚤》中的女人从故事一开始就不曾向男人轻易折服。诗歌到此嘎然而止,留下一个开放性的结尾,而不言胜负的开放性结局其实正是某种意义上的“和局”,一种博弈双方身份平等的隐喻和象征。总而言之,《跳蚤》中的女人并非没有话语权,只不过她的话语是透过男人的话语间接传递的;《跳蚤》中的女人也绝非男女对话和互动中的“他者”和“客体”,而是一个拥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参与者和表达者。

应该说,《跳蚤》中的男女是平等的,他们之间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互动的对话关系。可能有人会认为,《跳蚤》中的“Mark”、“Stay”等标识祈使语气的词语隐含了一抹男性霸权主义的色彩。其实不然。我们可以尝试着把诗歌中“Mark”和“Stay”替换成“Look”和“Wait”,前者的语气并不比后者强多少。“Mark”、“Stay”之所以会让读者产生上述感受完全是由于人们在阅读本诗时受到了批评界对于约翰·邓恩其他爱情诗歌女性主义评介的影响。另外,本诗的确让女人失去了直接表达话语的机会,

这一事实也极易让读者产生错觉,误认为《跳蚤》就是一个充斥着男权主义意识的典型文本。我们当然不会怀疑这种女性主义解读策略的合理性,可是我们也不应该因此就全然排斥使用其他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合理解读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女性主义批评的大量涌现是发生在约翰·邓恩去世几个世纪以后的事情。或许,约翰·邓恩在创作本诗的过程中确实受到了他所在时代的集体无意识的渲染,在《跳蚤》中渗透了男权主义思想。可是,我们也须提醒自己,女性主义批评只是我们解读文学作品的一种视角,绝对不是唯一视角。《跳蚤》之所以采纳这样的结构安排同样呼唤和欢迎其他合理的解读方法。比如,《跳蚤》中这种男女“失衡”的对话结构完全可以被视作约翰·邓恩别具匠心的艺术设计。对话双方,一方在明处,一方在暗处;一方为实,一方为虚;一方抛头露面,一方隐含不出。这种虚实结合,明暗呼应的对话策略就如同绘画艺术中阴影和光亮的巧妙配合一样会给作品带来一种立体通透的效果,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我们可以尝试着假设让《跳蚤》放弃原来的结构安排,改用模拟现实对话的形式展开,那将会是怎样的后果!诗歌结构变得平淡无奇不说,还会丧失诗歌本来绽放着的勃勃生机和充满灵动的艺术魅力。

不容忽视的是,发生在《跳蚤》中的这场男女“智斗”被诗人巧妙地安排了一个见证者——一只原本并不起眼的微小昆虫跳蚤。这只生活在邓恩时代的跳蚤也因了这首诗歌跨越遥远的时空和我们展开了一场富有诗意的对话。诗歌中的跳蚤在约翰·邓恩的笔下神奇地变化着身份,它鼓着圆圆的肚子,时而大至可以容纳男女情人的婚床和庙堂,时而小至可以将男女融合其中的黑玉般闪亮发光的微小生物体。如果我们的想象再丰富一些,这只被约翰·邓恩赋予了神奇力量的跳蚤不正是——一个抽象化了的宇宙概念吗?“圆圆的”肚子正好迎合了邓恩时代对于“圆圆的”宇宙的推想。这个宇宙可以宏观地指涉人类的生存空间——地球,男女主人公俨然代表了生活于其上的整个人类,也可以微观地指涉人类生命酝酿的原初状态——胚胎,男女交媾行为产生的直接结果。如是分析,《跳蚤》的主题不复是探讨男女关系这么简单,而是被提升到了探讨生活本质和生命意义的哲学高度。

可是,大千世界,芸芸物种,诗人缘何偏偏选中一只跳蚤作为诗歌的意象呢?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或许能为我们打开一条思考路径。巴赫金认为,言语本质上具有对话性。“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

的”。巴赫金言语本质层次上的对话实际上是对言语独语品质的彻底否定,让原本封闭的言语朝向外界开放。这个外界囊括了所涉言语以外的一切形式的存在。返回到诗中这只跳蚤,它的意义不是封闭的,它跟邓恩时代的一切存在发生对话,和邓恩之前之后所有时代的跳蚤文本发生互文。傅浩认为,“以跳蚤为题材的色情诗在16世纪的欧洲十分流行”,诗人之所以使用跳蚤为题材是因为他们“大多羡慕跳蚤能自由接近其情人的身体,或能在极乐状态中死于佳人之手。”他进一步指出,邓恩诗歌中的跳蚤可能是诗人对当时流行诗歌意象的创新运用,“跳蚤既‘叮’了‘她’也‘咬’了‘他’,从而使之成为渴望结合而非单纯欲望的象征。”^[4](P77)]傅浩是约翰·邓恩诗歌研究方面的专家,成果颇丰,但对于他的上述观点,笔者持怀疑态度。我们先不考究跳蚤作为诗材在当时是否流行,单就其对邓恩时代诗人偏爱使用跳蚤意象的原因分析,傅浩的结论过于简单,有牵强附会之嫌。即便当时诗人狂热使用跳蚤意象的陈述是真,原因也肯定是多方面的,绝非傅浩论中那么单一、肉麻和赤裸裸。倘若使用我们时代的话语同诗歌中的跳蚤进行对话,则不难发现:跳蚤能够闯入诗歌这门高雅艺术绝非偶然事件,它所折射的正是邓恩时代卫生状况极差的社会现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贫民百姓,人人都视跳蚤为常物,将是何等景象。按照这一路径进而思之,邓恩诗歌中的跳蚤其实正是曾经造成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猖獗流行,导致三分之一人口死于非命的罪魁祸首。明白这一点无疑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邓恩诗中跳蚤的社会语境。事实上,上述那场被载入人类发展史册的瘟疫浩劫在欧洲

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才宣告结束。尽管有确切资料显示,邓恩时代的人们压根不清楚跳蚤就是致命鼠疫的传播者这一事实,通过与这只跳蚤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互动,我们还是能够走近那个处处充斥着死亡气息的时代。在西方文化语境里,黑色是死亡的颜色,象征着忧郁、哀伤和恐惧。黑死病的症状也是皮肤生出黑斑,接着疼痛而死。诗歌中跳蚤黑玉般的外表不正是诗人用来装殓死亡的颜色吗?在《跳蚤》的第三节,诗人把黑黢黢的跳蚤跟“无辜者的鲜血”并置起来,不正是隐喻性指涉人生无常,强调“活在当下”的时代情绪吗?

把诗歌中男女主人公的互动式“对话”同跳蚤意象结合起来思考,我们会发现,约翰·邓恩在《跳蚤》一诗中所表达的实质上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生活观和伦理观的交汇和碰撞。男人一心想占有女性的身体,享受俗世的快乐;女人却矜持含蓄,一再拒绝男方的要求。男人使用跳蚤作为言说的工具,意在劝诫女人:人生无常,疾病肆虐,在死亡面前,一切道德伦理算得了什么!跟享受现世之乐相比,“罪恶、羞耻、贞操的丢失”又是何等的“微不足道”!而与之相反,女人所执行的一系列行为动作,从“毅然回绝”,到“举手欲拍”,再到“果断拍死”,所彰显的则全然是一种传统保守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灵与肉的思辨中,男人代表的是邓恩时代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群体中洋溢着享乐主义思潮,而女人体现的则是从中世纪神学统治年代里遗传下来的传统价值理念的深刻烙印。诗歌中男女对话关系的平等则表明:《跳蚤》是两种思潮的平等交汇和碰撞。诗歌开放性的结尾则反映出诗人自身充满矛盾的思维处境。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王守仁.英国文学选读(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 [2]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戏剧性独白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2004,2.
- [3]张德明.玄学派诗人的男权意识与殖民话语[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
- [4]傅浩.约翰但恩的艳情诗和神学诗[J].外国文学评论,1995,2.

Thematic Study of John Donne's "The Flea"

ZHANG Wu, XU Wen-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ongyan College, Longyan, Fujian 364012)

Abstract: The man and the woman in the battle of wits happening in John Donne's poem *The Flea* presents an equall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nd the flea, the only witness of the battle in the poem, symbolizes the hedonist thought prevailing in Europe of John's day. Putting the two together, we get to know that the poem is actually the externalization of two different moral ideologies latent in John Donne himself.

Key words: *The Flea*; John Donne; Metaphysical Poet

(责任编辑:张俊之)